
“君尊如天, 臣卑如地”

——明代宫廷内的起坐之间

Imperial Precedence at the Ming Court as Indicated by Seats

吴美凤

Wu Meifeng

内容提要：

中国国家家具在宋代全面兴发, 发展到明代已臻成熟。明代宫廷皇帝的坐具表现在绘画、文献等资料上是种类庞繁, 髹金朱漆而雕饰华丽。相形之下, 皇帝宠信的大臣平日谒见不是侍立一旁就是跪奏于地, 只有在皇帝开恩时才得赐坐。赐坐的坐具只有小杌子与板凳, 低矮简单、形制单一, 与皇帝坐具的繁杂多样、丰富多彩有天壤之别。同为汉人立国的宋代, 南宋朝廷内的陈设, 除皇帝御前所用外, 无不是成套成对的金漆椅具, 连人臣待朝之处亦如此陈设。明代的典章制度虽直追唐宋, 但人臣在宫廷的坐具却远瞠其后。与此同时, 明代内府太监取得坐具相对容易, 还可坐着不需钦赐的“人抬机凳”横行宫禁, 地位远高于人臣。由坐具差异可看出, 明代君臣之间“君尊如天, 臣卑如地”的现象非常明显。

关键词：

君尊如天 臣卑如地 起坐之间 坐具 小杌子

ABSTRACT: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witnessed the ri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urniture, which reached maturity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Ming emperors' seats, as represented in paintings and described in literature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ir rich variety, gold traceries, vermilion lacquering, and masterly-rendered carvings and embellishments. In comparison, court officials, however favored by the emperor, could only stand or prostrate themselves when receiving an imperial audience. They could not sit unless being explicitly instructed by the emperor, in which case they were only allowed to sit on simple stools, in stark contrast with the emperor's elegant and richly decorated seats. In the Song dynasty, established by ethnic Chinese as the Ming dynasty, aside from those specially dedicated to the emperor, full sets or pairs of lacquer chairs with gold tracery decorated the court interior, even in those halls where the officials awaited audience. Even though Ming-dynasty rites and regulations rivaled those of the Song period in terms of its quality and comprehensiveness, the seats court officials were entitled to lagged far behind. In the meantime, eunuchs in Ming imperial palace had comparatively easy access to seats. They were even carried around the imperial palace ostentatiously on enclosed official litters, the use of which required no imperial mandate. Such behavior manifests that the eunuchs enjoyed higher status than court officials. Judging by the discrepancy in terms of the quality of seats, Ming court officials were placed in a position of much pronounced inferiority in relation to the emperor, whose superiority "equals the heaven".

KEY WORDS:

the emperor's superiority equals to the heaven, the officials inferiority equals to nothingness, standing or sitting, seats

著名的历史学者余英时曾说：“曾静要是落到明太祖手上，其命运也许更悲惨。”¹曾静（1679～1735）是清代康熙中期的县学生员，以授徒为业，在雍正（1723～1735年在位）即位初年，派生徒张熙送信给当时手握西北重兵的川陕总督岳钟琪（1686～1754），劝其以先人岳飞受金人（满族之先世）之害起兵反清。事发后师徒二人先后被解送进京，由雍正亲自审问。雍正事后将其审讯曾静的问答言辞以及曾静受到雍正“感召”而“改邪归正”所写的《归仁录》收编成《大义觉迷录》，发行天下，并将曾静师徒二人免罪释放²。

《明史》钱唐传中，记明太祖读到孟子所说的：“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讎”后，觉得“草芥”、“寇讎”等语，“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想将孟子在庙祀的配享给撤了，还同时下令若有谁敢来谏抗议，将论以“大不敬”之罪³。明人宋端仪的《立斋闲录》也有一段说：“太祖尝一日读孟子，怪其与时君言多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活也？’”⁴意即太祖读了孟子这段言论后大怒说，孟子这老头儿若生在今日，还能活着吗？

像曾静这样一位思想反清，蠢蠢欲动，亟思谋反的人在雍正的手里竟然全身而退，而明太祖却因为一千多年前的孟子说了“非臣子所宜言”的话而动起杀念。这样看来，曾静要是落在明太祖手上，恐怕不但己身无法幸免，九族亦可能难逃牵连。如此帝王至尊之思想若反映在器用如坐具的使用上是何光景？本文尝试从明代宫廷的起坐之间观察明代君臣的关系，或可为明代宫廷史研究提供另一个角度的思考。

一 明代宫廷内皇帝的坐具——形制多样、雕饰繁复

首先看看明代皇帝有哪些坐具。皇帝的坐具统称御座，一般在朝会、觐见、进表、进书等庄严肃穆的场合所用，或称“金台”⁵，也就是近世所称的宝座，形制相对较为宏伟隆重，如明宣宗的坐像画，其宝座坐面宽广，扶手及靠背如建筑般的支架式架构，所有的出头都雕饰龙首，镶嵌杂宝、雕饰繁复，并且璎珞绦结、五色缤纷，整器呈现巍然的气势〔图一〕。宝座之外另有日常办公所用之坐榻，如黄淮（1367～1449）在朱棣南京登极



图一 宝座
明 宫廷画家绘，明宣宗坐像，轴，绢本，设色，纵210厘米，横171[1].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 余英时著：《历史与思想》，第66页，台北：联经出版社，1983年。

2 曾静事件发生于雍正六七年之间，雍正于十三年（1735）驾崩，乾隆继位后数月即将曾静师徒捉拿处死。参见《清高宗纯皇帝实录》，雍正十三年十二月甲申条，《清实录》第九册，第321页，中华书局，1986年。

3 钱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学敦行，洪武元年举明经，对策称旨，特授刑部尚书。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三九，列传二七，第3982～3983页，中华书局，1995年。

4（明）宋端仪撰：《立斋闲录》收入（明）邓士龙编：《国朝典故》卷六二，第14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宋端仪，字孔时，福建人，成化十七年进士，《明史》，卷一六一。余英时著：《历史与思想》，第66页，台北：联经出版社，1983年。

5 明宪宗时历任翰林学士、兵部尚书的尹直，其笔记写道：“今制，每旦常朝御奉天门，其御座谓之金台。”（明）尹直撰：《睿斋琐缀录》八，收入（明）邓士龙编：《国朝典故》卷六十，第13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图二 圈椅

明 宫廷画家绘，明宣宗坐像，轴，纸本，设色，纵252.2厘米，横124.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之后：“首蒙召见……凡侍朝，特命解公缙与公立于御榻之左，以备顾问……”¹坐面较为宽广深入²。现存宣宗另一坐像的坐具是圈椅，即明人所称的“太师椅”³，圈背扶手出头处雕饰龙首，龙身沿着圈背蜿蜒而上，其间还缀饰如意云头纹，连前腿的柱身也飘挂云头，龙饰极为醒目〔图二〕。其他还有靠背与扶手四出头的椅具⁴，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明宣宗宫中行乐图”中⁵，宣宗“捶丸”的右后方亭内所置，以及明宪宗在“元宵行乐图”中独坐黄幄内观赏杂技表演时所坐，皆为四出头坐椅，四出头皆雕饰髹金龙首。同样的坐具也见于万历十一年（1583）明神宗第二次谒陵活动的“明人出警入蹕图”，万历在舟中行坐的场景⁶〔图三、图四、图五〕。前引“明宣宗宫中行乐图”另一段描述“投壶”的宣宗所坐为胡床⁷，宪宗的“元宵行乐图”亦可见黄幄下的宪宗正跨坐在胡床上观赏庭院中的宫人提灯放炮〔图六、图七〕。而宣宗投壶身后亭内的长桌与屏风间所置为朱漆的圈背交椅，又称交椅，即胡床上增设圈背并扶手。此外，明人的“徐显卿宦迹图”册中⁸，徐显卿“捧敕”的画面，万历皇帝

所坐也是交椅，整器髹金，上覆朱红织金椅帔，扶手出头可见金色龙首〔图八、图九、图一〇〕。“明人出警入蹕图”的仪仗中，二名仆役所扛的亦为交椅，黄袱套下两端还露出的髹金龙首。交椅与胡床都有轻便、可折叠的特点，皆为明代皇帝在宫苑内外常用的小坐具，整器髹金的“金交椅”更是朱元璋在吴元年制定皇帝仪仗的清单之列⁹。交椅在高形家具初兴，高坐逐渐普及的宋代，被尊称为“太师椅”¹⁰。

与此同时，皇帝在宫内游幸行乐的交通工具为“椅轿”，也称“轿椅”，或称“显轿”或“明轿”。前述“明宣宗宫中行乐图”中，宣宗坐胡床戏玩“投壶”之后起驾回銮所坐的正是“椅轿”，系将四出头坐椅之腿柱改

- 1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一二，《内阁三荣禄大夫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谥文简黄公淮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第3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2 参见吴美凤撰：《明代宫廷家具史》初稿，第三章第一节。
- 3 宋明清三代所称太师椅形制有别，宋代太师椅为圈背交椅，明代太师椅仍为圈背但坐面下四腿足固定，清代太师椅仍固定四腿足但搭脑与扶手合为山字形。参见陈增弼撰：《太师椅考》，《文物》，第84～87页，1983年8月。
- 4 王世襄的“明式家具”中称此四出头椅具为“官帽椅”，王世襄编著：《明式家具研究》，文字卷，第38页，台北：南天书局，1989年。
- 5 “明宣宗宫中行乐图”自卷首开展依次有射箭、蹴鞠、马球、捶丸、投壶及回銮等六段场景，宣宗亲与行乐的为捶丸、投壶二景。除投壶外，观赏射箭、蹴鞠、马球等段所坐具为胡床。此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学者研究，画中皇帝应为明宪宗，并非明宣宗（参见Wang, Chenghua, “Material Culture and Emperors: The Shaping of Imperial Role at the Court of Xuanzong”,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8, pp221～225.）唯此部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本文暂依北京故宫博物院编，《永宣文物萃珍》，第36～37页，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 6 “明人出警入蹕图”为万历十一年谒陵活动之说，参见朱鸿撰：《“明人出警入蹕图”本事之研究》，台北，《故宫学术季刊》，2004年秋季。
- 7 胡床或称交床、交机，为可折叠、无靠背之轻便坐具，即一般通称的折叠椅。
- 8 “徐显卿宦迹图”册，分段描写隆庆二年（1568）进士徐显卿（1537～1602）一生仕宦经历，每段皆有文字纪事，注明时间并附插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 9 朱元璋开国前的吴元年十二月制定皇帝仪仗中设“金交椅”，尔后宣德元年更造卤簿仪仗中含金马机。（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十四，志四十，仪卫，第1587～1592页，中华书局，1995年。
- 10 交椅或称校椅，圈背交椅宋代称栲栳样交椅，据宋人的笔记：“宰执侍从皆用之”，后因秦桧曾坐其上，“偃仰片时坠巾，京尹吴渊奉承时相，出意撰制荷叶托首……凡执宰侍从皆有之，遂号太师椅。”此即宋代的“太师椅”。参见陈增弼撰：《太师椅考》，第84～88页，《文物》，1983年8月。



图三 四出头坐椅
明 宫廷画家绘，捶丸 明宣宗宫中行乐图卷（局部），绢本，设色，纵 36.6 厘米，横 687 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四 四出头坐椅
明 宫廷画家绘，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局部），绢本，设色，纵 37 厘米，横 624 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图五 四出头坐椅
明 宫廷画家绘，明人出警入蹕图卷（入蹕局部），舟中行坐，绢本，设色，纵 92.1 厘米，横 3003.6 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六 胡床
投壶 明 宫廷画家绘，明宣宗宫中行乐图卷（局部），绢本，设色，纵 36.6 厘米，横 687 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七 胡床
明 宫廷画家绘，宪宗元宵行乐图卷（局部），绢本，设色，纵 37 厘米，横 624 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图八 圈背交椅
明 宫廷画家绘，明宣宗宫中行乐图卷（局部），绢本，设色，纵 36.6 厘米，横 687 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九 圈背交椅
明 万历 余士等绘，捧敕，徐显卿宦迹图册（部分），绢本，设色，纵 62 厘米，横 58.5 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一〇 圈背交椅
明 宫廷画家绘，明人出警入蹕图卷（出警局部），绢本，设色，纵 92.1 厘米，横 2601.3 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一一 椅轿
明 宫廷画家绘，明宣宗宫中行乐图卷（局部），绢本，设色，纵 36.6 厘米，横 687 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为板座，长轿杆穿过板座外的环扣，前后各一名太监从杆端处起索，攀过肩颈抬至腰处行走¹，画中可见左右另有太监躬身协力扶持〔图一一〕。

至于皇帝在正式仪典中的交通工具则为“红板轿”，或称“板舆”、“板轿”或“舆”，属卤簿仪仗之列，虽为五辂及各式辇具之末，也是礼制中“辨贵贱、明等威”的工具之一，形制与雕饰皆有严谨的规定²。嘉靖十年（1531）西苑仁寿宫落成宴，“上乘板舆至仁寿宫，各官及侍卫等官于殿门外东西序立迎候，上降舆，升座。”

1 此与唐太宗“步辇图”中所示相近，是称为“腰舆”的异法。参见沈从文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第 229 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 年。

2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十五，志四十一，舆服一，第 1604～1605 页，中华书局，1995 年。



图一二 红板轿
明 宫廷画家绘，明人出警入辟图卷（出警图局部），纵92.1厘米
横2601.3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宴毕，嘉靖又“乘輿还宫”¹。隆庆四年（1570）庆贺冬至仪后之赐宴，“与宴官俱序列于丹墀东西迎驾，候驾过殿内，与宴官随即趋入分班序立，上常服乘板輿，由归极门出入皇极门，乐作，至殿上降輿，升座，乐止，鸣鞭……”²万历的“出警入辟图”中亦可见到此十二人扛的红板轿〔图一二〕。

综合以上明代皇帝常见的坐具，宫内外一体通用，穿着袞服所用庄严隆重的宝座；日常视事的坐榻、圈椅；巡幸或行乐的四出头椅、交椅、胡床；宫苑游走乘坐的椅轿；以及仪典所用的板轿等共约八类，形制多样，雕饰繁复，外表髹金朱漆，器身或雕或绘，皆饰龙纹，以象征真龙天子。相较之下，宫廷之内面对天子的人臣所坐为何？

二 明代皇帝尊称的“先生”们都坐在小机凳上

明代开国前的至正十九年（1359）天下群雄并起之际，朱元璋的部众攻下浙东，邀聘当地宿儒刘基（1311～1375）、叶琛（1314～1362）、宋濂（1310～1381）与章溢（1314～1369）一起到集庆（南京）请益，朱元璋对他们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纷纷，何时定乎？”³朱元璋尊称四人为“先生”，四人也纷纷献策。秦从龙（1296～1365）曾为元朝官员，朱元璋打下镇江时，亦闻其名而邀其到访：“上（指朱元璋）称先生而不名，每岁生日……或亲至其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⁴，朱元璋称其所敬重的宿儒或贤达为“先生”。开国以后，明代诸帝对辅政的阁臣亦沿此尊称，如孝宗大渐时，召刘健（1433～1526）等阁臣入乾清宫，拉着刘健的手说：“先生辈辅导良苦。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生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⁵这位年幼的东宫就是后来继位的武宗。武宗虽然锐目扬眉、桀骜不驯，却也行礼如仪地对刘健等阁臣说：“先生辈劳苦，朕甚念之。”⁶六七十年后，十岁的万历登基为帝，生母慈圣皇太后对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说：“我不能视皇帝朝夕……先生有师保之责，与诸臣异，其为我朝夕纳诲，以辅台德，用终先帝凭几之谊。”慈圣皇太后认为张居正有“师保之责”，与别的臣僚不同，尊其为“先生”。少年万历对张居正自然也相当倚重，称其“元辅张少师先生”，在其丁忧回籍期间，还告诫次辅吕调阳（1516～1580）等，“有大事毋得专决，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⁷

明代各朝皇帝尊阁臣为“先生”之例不胜枚举，此称呼对经筵讲官们也一体通用。看起来有明一代十分

1（明）李东阳等奉敕撰：《大明会典》，卷七十二，礼部，嘉靖十年西苑仁寿宫落成宴仪，第1158页，台北：东南书报社，1963年。

2《明穆宗实录》，卷五十，隆庆四年十月丁酉条，第1244～1246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

3（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二八，列传一六，第3790页，中华书局，1995年。

4（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一一六，秦从龙传，《续修四库全书》，第5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5（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八一，列传六九，第4813页，中华书局，1995年。

6《明武宗实录》，卷一九七，正德十六年三月癸卯条，第3689～369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

7（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一三，列传一百一，第5646～5648页，中华书局，1995年。

礼贤尊能，尤其对辅政的阁臣们十分崇敬。然而，据明人邓士龙的《国朝典故》：“内阁诸老，自解、胡以来，皆东西分坐小杌子及两小板凳，无交椅、公座之设。”¹“解、胡”指解缙（1369～1415）、胡广（1369～1418），两人是洪武、永乐两朝皇帝宠渥有加、勋业功高的内阁大学士。换言之，明代宫廷内皇帝倚为股肱的内阁重臣，没有交椅或公座可坐，平日的坐具是小杌子及小板凳。

（一）交椅和公座

“公座”即皇帝诸多坐具中的交椅，上覆椅帔，是元代以来衙署内最高长官的座位〔图一三〕。明代开国以后亦承其旧制，各地衙署的仪门内，以长官的公座和审案的大堂为整个衙署办公的中心位置，有如紫禁城内太和殿皇帝的宝座是整个紫禁城的中心点一般，代表皇权延伸至每个公门衙署，有其尊崇与权力的象征与意涵。明初订文武官员服制：“在外文武官，每日公座服之。”²亦即衙署之内的长官要穿了公服才能坐上公座。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诏令礼部：“凡官民人等服饰不得用玄黄、紫色，公座案衣旧有紫者不在禁限。”³“案衣”是公座前所设大案的桌围。描述明初开国的《新镌龙兴世录皇明开适英武传》中有一幅“太祖差冯胜督工”⁴，画中“太祖”所坐即为“公座”，所据之案则有案衣层层围住。公座必覆椅帔，一般衙署所见之公座，文官椅帔皆为绚丽的织绣，武将多覆兽皮〔图一四〕，如明人版画《镌出像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中的杨家将的故事，或《新刊重刊附释标注出像伍伦全备忠孝记》中衙署长官办公的“备掌朝纲”等〔图一五〕。兽皮可能来自老虎，也可能是贵重的貂皮，晚明的沈德符记张居正当国的万历初期，“辽左帅臣各缉貂为帐，



图一三 公座

“太祖差冯胜督工”，明南京齐府复建安杨明峯重刊本，转引自周芜编著：《金陵古版画》，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页394



图一四 公座覆兽皮

明 纪振伦撰，万历三十四年卧松阁版。转引自周芜编著：《金陵古版画》，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页291



图一五 “备掌朝纲”

明 无名氏（丘海）撰，明万历间瑯谷唐氏世德堂刊本，北京图书馆。转引自周芜编著：《金陵古版画》，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页92

1 (明)尹直撰：《斋斋琐缀录》四，收入(明)邓士龙编，《国朝典故》卷五九，第128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2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七，舆服三，第1636页，中华书局，1995年。

3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六，洪武十五年六月壬辰条，第2287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

4 冯胜是开国初受赐铁券的二十八功臣之一。参见(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八、志四四，卷一二九、列传一七，第1661、3795页，中华书局，1995年。

其中椅、榻、櫪、杌俱饰以貂皮，初冬即进，岁岁皆然”。¹亦即驻守辽东地区的将帅所用之家具俱饰以貂皮，公座所覆自然也不例外。

衙署公座除了使用织锦、兽皮之外，朱元璋还有惊人的创举——将贪赃处死的官员剥了皮置公座椅背，成为人皮“椅帔”，以为后任新官警惕之用²，衙署大小官员皆无法回避如此触目惊心的场面，因为大明律令有一条规定：“凡大小官员无故在内不朝参，在外不公座署事……一日笞一十，每三日加一等……”³衙门内的大小官员，每日要在公座前互行肃揖礼，官员若不对着血淋淋的人皮公座署事，自己还得受皮肉之苦⁴。洪武初年的李叔正（？～1381）任监察御史时，出巡岭南，琼州府的小吏举告其长官“踞公座，签表文”，就是盘腿在公座上签公文，经查访得知是诬告，反将小吏治罪⁵。可知官员未正襟危坐于公座上，形同对帝国与皇权的不敬，都是犯罪的行为。

（二）内阁诸老所坐的小杌子、小板凳

明英宗天顺年间，内阁辅臣李文达（？～1466）想依照诸臣的品秩，在内阁“设公座如部堂之仪”，另两位阁臣彭时（1416～1475）与吕原（1418～1462）皆出言反对，因为往昔宣宗“尝幸此中座，今尚有御赞寿星及宝训在上，谁敢背而坐？”换言之，以前宣宗移驾至此所用之坐具，以及当日留笔之宝训仍在，在此另设公座随意起坐其间就是大不敬。英宗获悉此事后，“乃赐孔子铜像置阁，而月给香烛。阁老每晨入，必一揖，冬至、正旦则翰林合属官皆诣圣像前行四拜礼，学士以上拜于阁中，余则列拜于阶下。”即英宗在原来宣宗坐过之处摆上孔子铜像，众臣因而每日早晨入班必先一鞠躬，遇节日还要行四拜礼。也就是说，宫墙之外的各地衙署皆设置公座，官员坐在上面代表皇帝执行皇权，而紫禁城内唯皇上至尊，当然就没有设置公座的必要，不但没有公座，甚至连皇帝坐过的位子，都仿佛天威犹存似的没人敢再坐，也不能坐。同样的场景在景泰（1450～1456）时也发生过，代宗有一次到文华殿侧室，看视内臣（太监）们上学状况，对讲官倪谦（1415～1479）、吕原有所垂询，他日代宗再去视察，发现这二位侍讲已改坐别处，因为“君父所坐，臣子不敢当。”⁶凡此种种，都是因为“禁中尊止宝座，无敢面南，故自阁老而下，皆坐杌子。”⁷

小杌子是单片木板下接四根腿足的组合，是无扶手、无靠背的木制坐具，北方有时叫“杌櫪”⁸。杌子高矮略有所差，坐面有方有圆，因此有方杌、圆杌之分。北宋人王居正有一幅“纺车图”，一手摇纺轮，腾出另一手哺乳喂婴的村妇所坐即为小杌子，素木无漆，卡榫非常清楚，反映小杌子是简便普及的庶民坐具〔图一六〕。南宋宫廷画家马远的作品“Composing Poetry on a Spring Outing”，有一名长身站立的文士正欲下笔为诗，身后的黑漆方杌呈编织坐面，卷云直足下施一圈托泥，简明中另见细致〔图一七〕。与纺车村妇所坐相

1 (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卷二四，第614页，中华书局，1997年。

2 “帝开国时其重辟自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躺置铁床上，沃以沸汤，以铁刷刷去皮肉……有剥皮，剥脏酷吏，皮置公座上，令代者坐以惩之……”参见(明)吕毳辑：《明朝小史》，卷一，国初重刑，页史19-456，《四库禁毁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

3 黄彰健著：《明代律例汇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七十五，第431页，1979年。

4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五六，志三二，品官相见礼，第1427页，中华书局，1995年。

5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三七，列传二五，第3956～3957页，中华书局，1995年。

6 (明)焦竑著：《玉堂丛语》，卷三，讲读，第71页，中华书局，2007年。

7 (明)尹直撰：《饕斋琐录》七，收入(明)邓士龙编，《国朝典故》卷五九，第128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8 王世襄编著：《明代家具研究》，文字卷，第173、188页，台北：南天书局，198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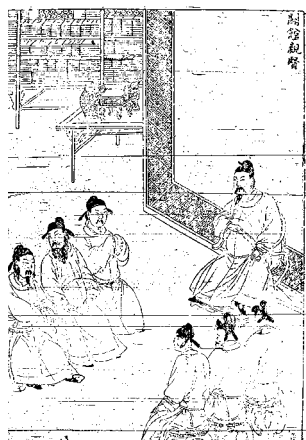


图一六 北宋 王居正 纺车图
卷，绢本，设色，纵26.1厘米，横69.2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



图一七 南宋 马远
Composing Poetry on a Spring Outing, 卷，绢本，设色，纵29.3厘米，横302.3厘米，
美国堪萨斯的尔逊美术馆藏

较，同为机凳类轻便小坐具，但是精粗有差、繁简有别。晚明的焦竑（1540～1620）曾撰《养正图解》以为太子朱常洛（后来的明光宗）出阁讲学用，其中的“辟馆亲贤”¹描写“唐太宗”高坐交椅上，左右文学之士如燕翅般两溜排开，俱坐于一式低矮的圆机上〔图一八〕。若腿足略长，供上下马所



图一八 明 焦竑撰，丁云鹏绘，
辟馆亲贤《养正图解》
明万历二十二年吴怀让刊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



图一九（传）元 钱选杨妃上马图（线绘）
转引自陈增弼撰，《马机简谈》，《文物》，1980，第4期，页83

用又称“马机”²，传为元代钱选的“杨妃上马图”，就描写“杨妃”在宫人的搀扶下正踏在一只曲腿圆机上马〔图一九〕。具体形制则有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方机作为参考。至于小板凳，则是单片木板两端下接板足，侧看形成“凵”字形，形制更为简单。

三 开国一百年以后才有“连椅”可坐

根据《睿斋琐缀录》，堂堂内阁大臣“皆坐机子”一直持续到成化中期，宪宗才“赐内阁两连椅，藉之以褥。又赐漆床锦绮衾褥三副，以便休息。阁门则夏秋悬朱筠帘，冬春紫毡帘，皆司设监内史以时供张，恩何

1 “辟馆亲贤”讲唐太宗当年如何辟弘文馆置四书经籍，并召文学之士如虞世南、欧阳询等诸人入馆商推政事等。

2 陈增弼撰：《马机简谈》，《文物》，第82～84页，第4期，1980年。



图二〇 清初 紫檀鼓腿彭牙方机
长宽57厘米，高52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渥也。”¹成化（1465～1487）一朝有二十三年，成化中期约当成化十二年左右。换言之，明代的阁臣们坐了一百余年的小杌子，至此才有个“连椅”可坐，并且还有舒适体面的“漆床”，并附设“锦绮衾褥三副”。内阁²的门扉又在太监的张罗下，夏秋间有竹帘，冬春间有毡帘，撰文的兵部尚书尹直（1427～1511）对宪宗的“宠遇”，觉得“恩何渥也”，似乎就要涕泗纵横了。所谓的“连椅”，依据今人解释，就是有靠背、椅面向两旁延伸以供二人以上所坐的长椅子。张居正任职太子少师时，曾撰有《帝鉴图说》一书，引古圣先王之德作为太子规鉴，其“任用三杰”图中，“汉高帝”之侧为韩信、萧

何与张良等三人，其余官员左右排开，四人一列所坐即为连椅。

不过，即使内阁有御赐的“连椅”可坐，宪宗之后的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春天还是发生阁臣“晕倒在凳”的事。事主是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1447～1516），他在退朝后，因“旧患眩晕等疾，不时举发……二月十三日朝退，辄复晕倒在凳，坐不能起……”³此记并未明说李东阳晕倒之处，推测李东阳退朝后尚不及走至设有“连椅”的内阁就不支而“晕倒在凳”，也因杌凳低小，李东阳晕眩之余，还“坐不能起”的一时站不起来。由此可见，宪宗时期的“连椅”之赐可能未恩及他处，凳杌类的小坐具仍是有明一代阁臣在宫内的通行坐具〔图二〇〕。

杌凳之为用，不仅是阁臣的坐具，还是国子监内进行“扑作教刑”时的工具。凡教官怠于师训、生员有戾学规或课业不精，都在监内“绳愆厅”问刑。直厅的皂隶二名，也是行刑人，刑具是竹篦。厅内有“行扑红凳二条”，就是小杌凳两端延长成条凳，再漆上朱红色，让犯过的人伏着挨打。依照学规，生员最多也只有伏在红色条凳上三次的机会，因为初犯“记录”（类似今日的记过），再犯赏竹篦五下，三犯竹篦十下，四犯就发遣安置，如开除或充军等。国子监不但有处罚权，也有刑训的执行权，集学校、法庭与刑场为一体⁴。此外，杌凳小件在明代也作为“从殉”的工具。朝鲜的《李朝实录》记成祖驾崩，朝鲜先后送入的宫人皆从殉：“当死之日，皆餉之于庭，餉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小木床，使其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经而死。”⁵此“小木床”即小杌凳，轻巧简便，时辰一到，太监可以很快地出脚“去其床”，刹那间就完成宫人的从殉。

1 （明）尹直撰：《睿斋琐缀录》七，收入（明）邓士龙编，《国朝典故》卷之59，第129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2 明代内阁“在午门东南隅，外门西向，阁南向，入门一小坊，上悬圣谕，过坊即阁也。”，与并列的制敕房、诰敕房皆在嘉靖十六年（1537）重建。参见孙承泽撰：《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三，内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68册，第868～262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3 《明孝宗实录》，卷一七二，弘治十四年三月壬子条，第3126～3127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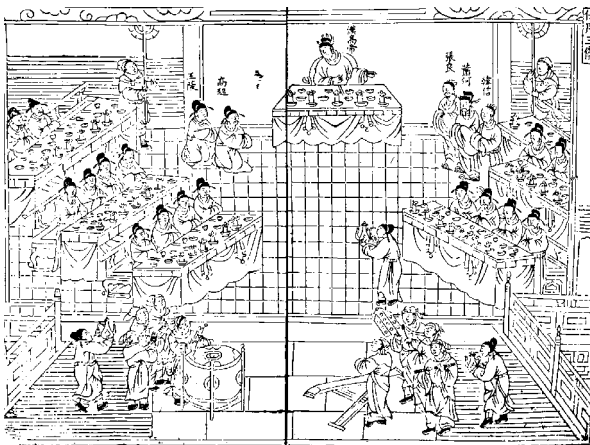
4 （明）黄佐撰：《南雍志》，卷九，谏训考，学规本末，《续修四库全书》，第278～2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吴晗著：《朱元璋大传》，第165页，台北：远流出版社，1991年。

5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20～321页，中华书局，1980年。

四 宫廷内阁员一天的开始

在此严峻的礼制氛围下，明代紫禁城内一天的开始是这样的——每日清晨门吏报三鼓时，官员们齐聚左掖门等候，“阁老直门东向立，诸学士立稍后而南，讲读等官又后稍南，给事中则立于讲读等书之后北上，通政、太常、光禄、太仆、顺天府诸堂上官又聚立于给事之北说谎牌之下，皆东向。御史则北向立于中书之南，而六部堂上官则立于棕蓬之下。”所有大小官员依品秩各就其位，并分开站立，有“禁防请托”之寓意¹。一直到成化初年，内阁首辅彭时因气喘无法久站而坐上小凳子，此事意外惠及六部尚书与侍郎们，往后在待朝时可同坐凳上，但讲读以下诸官仍站立原处等候上朝。

上朝时，百官全站在殿外听候鸣鞭行礼。礼毕入殿内奏事，除非特别赐坐，否则全员一律站着，站立之位置也有定制，文东武西，依品秩高低排序向外站立。早朝若在华盖殿：“四品以上官入侍殿内，五品以下仍前”，就是五品以下仍向北站在殿外。若圣驾



图二一 明 任用三杰，江陵张太岳撰，《帝鉴图说》
明刊本，转引自方骏等编：《中国古代插图精选》，第4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

御奉天殿，则“五品以下诣丹墀，北向立，五品以上及翰林院、给事中、御史于中左、中右门候鸣鞭，诣殿内序立。”²永乐初年，成祖常驻北京行在，也曾因“北京冬气严凝，卫臣早朝奏事，立久不胜，寒冬下不耐久站，于是朝会行礼后，君臣改在便殿内奏事”³。无论在哪个殿上朝，五品以下的官员连进入殿内站立的资格都没有。而在殿内，代表外廷最高位阶的内阁官员与皇帝的贴身锦衣卫分别站在宝座的東西两旁⁴。据史料所载，永乐时期锦衣卫的位置原是司礼监太监所有，成祖晚年健忘，“宝座后常有一二宫嫔从立纪旨”，如此与宫嫔“近在咫尺”，使得站在宝座旁边的阁臣金幼孜觉得局促不安，就自请站到殿外的丹陛下⁵。凡此说明大明宫廷内的早朝，只有特定的少数人在待朝时有个小凳子暂时歇脚。朝会进行中，依照礼制规范，唯一坐着的人是宝座上的皇帝〔图二一〕。

永乐到景泰五朝为官的吏部尚书王翱（1384～1467），曾见一主事在左顺门旁与一名旧识太监谈笑自若，立即上前斥责：“……此地岂是你嬉笑之所？后生如此轻薄邪。”申斥的理由就是“奉天门御榻在焉，左顺去奉天不远”⁶。奉天门就是后来的皇极门，入清后改称太和门。左顺门在午门内东庑正中之门，后改称会极门，清代叫协和门。虽然两门之间有内金水桥相隔，王翱仍觉得行走的官员要神色庄重，不可随意谈笑。对皇帝

1 （明）尹直撰：《睿斋琐缀录》四，收入（明）邓士龙编《国朝典故》卷五六，第12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2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五三，志二九，常朝仪，第1350～1352页，中华书局，1995年。

3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五三，志二九，常朝仪，第1353页，中华书局，1995年。

4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五三，志二九，常朝仪，第1353页，中华书局，1995年。

5 （明）尹直撰：《睿斋琐缀录》七，收入（明）邓士龙编《国朝典故》卷五九，第13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6 （明）陆容著：《菽园杂记》，卷十，第120页，中华书局，1997年。按：王翱，参见（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七七，列传六五，第4699页，中华书局，1995年。



图二二 明万历 余士等绘，捧敕，徐显卿宦迹图册（部分）
绢本，设色，纵62厘米，横58.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御座的至高尊崇，明代还有一条“擅入御座者律绞”之令¹。对官员的进退，也有具文的“百官朝见仪”与“出入仪”等加以规范，如禁止“指画窥望”，就是上朝或出入宫苑不可比手画脚、东张西望。洪武二十六年（1393）所定的规矩，官员入朝时要“拱手端行，威仪整肃，不许私揖及吐唾”，除非是“眩晕或感疾”，否则不许“搀越失仪”，大致就是端庄肃穆的各自前行，不可私下行礼、吐痰和勾肩搭背等。官员上朝和退朝的动线是“文武东西，不许径越御道”，如在奉天门上朝，东边的官员要到西边，得绕金水桥南行再往西走，不准径越“御道”。凡“御座”所在之处就是“御道”或叫“中道”、“正道”，只有手捧“朝廷颁降诏书册命”时才可从“中道”出，但一出中门得立即偏东而行。前举“徐显卿宦迹图册”的“捧敕”一景，可见徐显卿双手高捧敕书，正步下中道，走向跪候于地的受敕官，背后丹墀中道之上，正是端坐在交椅上的万历皇帝〔图二二〕。

至于受命跟随皇帝行走中道的宦官随侍人等，其身躯要“常北面，不南向，左右周旋不背北”²，也就是不管左转或右转的前行，都不准背对着皇帝。前朝宫殿间如此，后朝内寝之处也是一样，在进入内府时，不得从门的中间大摇大摆进出，从东边来的要贴着东边的门走，西边来的贴着西边走³。

因此，设若时光倒流，回到五六百年前的明代宫廷内，奉天殿内的“御榻”或“御座”之前的“中道”，若不见皇帝与其随侍一行的身影，就是空荡荡的一条“正道”，肃然凝静，活动于“正道”左右两边的大小官员们则行止无声的来去，至多是低声喁语，此寂静而忙碌的景象，正是强烈宣示皇帝“宝座”或“御榻”之威仪与皇权所象征的至高权力。

（一）赐坐、侍坐——人臣的“宠遇”

大明宫廷内的大臣与皇帝论政时也有坐下的时候，那就是“凡朝退燕闲及行幸处，文职三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及勋旧文学之臣，赐坐。其余非奉特旨，不许辄坐。”⁴此外就是有宠于帝之时。焦竑《玉堂丛语》中有一段《宠遇》：“高帝建国初，遣使者樊观以束帛召青田刘基、丽水叶琛、龙泉章溢、金华宋濂至建康，入见，上喜甚，赐坐。”⁵刘基就是刘伯温，足智多谋，料事如神，《明史》说他“尤精象纬”⁶，是稗官野史中擅长占卜数术的传奇人物。宋濂以文学受知，随侍太祖左右达十九年，太祖赞誉他：“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⁷每次召见，必赐坐，还赏茶喝。焦竑本身任翰林院编修，也

1 (明)朱国桢撰：《涌幢小品》，卷五，拦驾，《丛书集成三编》第71册，第562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

2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五三，志二九，常朝仪，第1351页，中华书局，1995年。

3 (明)俞汝楫等编撰：《礼部志稿》，卷十，百官朝见仪出入等仪附，《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7册，第597～134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4 (明)李东阳等奉敕撰：《大明会典》，卷四四，礼部，百官朝见仪，第826页，台北：东南书报社，1963年。

5 (明)焦竑著：《玉堂丛语》，卷三，宠遇，第75页，中华书局，2007年。

6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二八，列传十六，第3777～3782页，中华书局，1995年。

7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二八，列传十六，第3784～3788页，中华书局，1995年。

参与纂修国史，博览群书。在焦竑眼中，太祖对刘基、宋濂等人的赐坐，是人臣的“宠遇”。明朝二百多年中，其他见诸正史记载蒙此“宠遇”者，似乎也只有受命草拟《平西诏》的陈遇（1313～1384）、奉敕制作《礼制集要》等训诰的刘三吾（1319～1400）、与宋濂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的王祚（1321～1372），以及入明时已垂垂老矣的前朝耆儒鲍恂、罗复仁（1306～1381）等¹。洪武年间的进士陈性善，则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在退朝后独留“赐坐，问治天下事”。陈性善在靖难变起兵败后报主隆恩，以“朝服跃马入河以死”²。前举的解缙与黄淮，永乐朝同直文渊阁，常站立成祖左右“备顾问，或至夜分，帝就寝，犹赐坐榻前语”。³此种可在皇帝榻前坐着说话的殊遇，往后的仁宣各朝，乃至明亡，都不多见。

对宠臣的“赐坐”也有规定，洪武二十六年有令：“凡赐坐，不许推让。”虽不可推让，但也不是可以一直坐着，“遇有顾问，初时跪对。毕，即坐。若复有所问，坐朝上对，不必更起。”⁴皇帝初次垂询时要起身跪下答话，再有问话才可坐着回话，但也要面对皇帝。另外又规定：“文武官员御前侍坐，遇有大小官员奏事，必须起立。候奏事毕，复坐。不许倨坐失仪。”⁵亦即坐要有坐相，不可失了仪态，任何官员奏事，全体都得起立聆听。因此，想象大明宫廷内的集会，面对皇上的垂询，官员的回奏此起彼落，“赐坐”或“侍坐”的官员得忽坐忽跪，才坐下又站起来，其实也并不轻松。

辅佐朝政因“荣宠”赐坐的人臣看起来寥寥可数。但开国之初，却有不知凡几的受戒之僧蒙此恩遇：

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襴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论讲，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⁶

此外，《明史》称为“铁冠子”的方伎之客张中，在朱元璋扫荡群雄的诸多战役中位居幕府，占验奇中，尤其在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中，料事如神⁷，是僧众之外受此“宠遇”之最者。无独有偶，嘉靖好鬼神，极信谶语，宫内斋醮不断，史料记其：“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独仲文得时相见，见辄赐坐，称之为师而不名……。”⁸“仲文”指龙虎山道士邵元节推荐的另一道士陶仲文，得宠二十年。一人兼领少傅、少保与少师三孤者，终明之世，仅此一人。嘉靖每召见都赐坐，还尊称“师”，不直呼其名姓。如此看来，为了拉拢儒士，只有开国前后太祖之“赐坐”较为频仍，而后的历朝皇帝仿佛连此“宠遇”都轻忽了，偶或“赐坐”，对象则是方伎道人之流，并非辅佐朝政的人臣。

1 分见（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三五，列传第二三，第3913页；卷一三七，列传二五，第3941页；卷二八九，列传一七七，第7414～7415页；卷137，列传二五，第3946、3958页。中华书局，1995年。

2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四二，列传第三十，第4034页，中华书局，1995年。

3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四七，列传第三五，第4123页，中华书局，1995年。

4 （明）李东阳等奉敕撰：《大明会典》，卷四四，礼部，百官朝见仪，第826页，台北：东南书报社，1963年。

5 （明）李东阳等奉敕撰：《大明会典》，卷四四，礼部，百官朝见仪，第826页，台北：东南书报社，1963年。

6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三九，列传二七，第3988页，中华书局，1995年。

7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九九，列传一八七，第7640页，中华书局，1995年。

8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百七，列传一九五，第7896～7897页，中华书局，1995年。

(二) 宫廷内的群坐之时——“大朝会锡宴”与“视学”

除了人臣、僧道的个别“恩渥”，大明宫廷内另有礼制上对特定品级官员的赐坐，那就是“大朝仪锡宴”、“视学”或便殿赐宴、朝后召见等。“大朝仪”是仅次于皇帝登极的重要仪式，需陈列大驾卤簿，天子五辂尽出。宋沿唐制，于正旦、冬至、五月朔及千秋节等举行，明制则是正旦、冬至与立春日，百官参与其会。¹其中文官三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可入殿朝贺并赐坐进宴。另在在洪武年间，朝参官早朝完毕都会“赐食”：

太祖御奉天门或华盖、武英等殿，公侯一品待坐门内，二品至四品及翰林官坐于门外，于五品以下于丹墀内，文东武西，叩头就座，光禄寺以次设饌，食罢，仍叩头而退²。

“赐食”而坐叫“待坐”，有别于论政的“赐坐”，此“待坐”在洪武末年，因“赐食”供给困难而停止。“视学”的“赐坐”是到国子监大成殿进行祭拜先师孔子后的讲经之时。讲经之前的祭拜仪式完成，皇帝在彝伦堂内的御座就座后：

赞举经案于御前，礼部官奏请授经于讲官，祭酒跪受，赐讲官坐。乃以经置讲案，叩头，就西南隅设几榻坐讲。赐大臣翰林儒臣坐，皆叩头，序坐于东西。诸生圜立以听³。

“视学”之礼于洪武十五年定制，历经宪宗、孝宗以迄世宗，在祭器与祭品方面多所增润，讲经的礼仪不变，讲官们一直都受赐在大堂“西南隅设几榻坐讲”，即讲官是坐着讲的，听讲的官员是站立的。成化元年（1465），宪宗将“赐大臣翰林儒臣坐”扩大为“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院学士坐。”并将原来“诸生圜立以听”改为“学官诸生列班，俱北面跪听”。⁴就是能坐着听讲的官员增多，但听讲的学官诸生要“跪听”。此制间接抬高讲官的位阶，也许符合传统“天地君亲师”五恩之礼。但成化晚期却发生要“讲官跪讲”之事，成化十九年（1483），詹事彭华（1432～1475）与左中允周经⁵为太子（后来的孝宗）进讲御制文华大训：“东宫每起立拱听”，当时身为学生的孝宗是站着听讲的，但阁臣万安（1419～1489）觉得太子过于劳累，就建议“讲官宜跪，请坐听”。太子起立拱听原为培养“皇储尊崇御训，隆礼师傅，谦恭仁孝之盛节”，但万安“务为谄谀”之举⁶，竟然要讲官跪讲。后来虽然并未从万安之议，但已造成往后的进讲成为学生坐着听，老师站着讲的定制。嘉靖四十年（1561）裕王朱载堉与其弟景王朱载堉出阁读书时，礼部更奉敕定下“二王讲读”礼仪：

内侍官先一日设椅子二把于北第一间书堂内……是日早，辅臣三员率领各讲读侍书官共十二员

1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五三，志二九，第1351页，中华书局，1995年。

2 (明)余继登撰：《典故纪闻》，卷五，第96页，中华书局，1997年。

3 (明)李东阳等奉敕撰：《大明会典》，礼部，卷之五一，视学，第906页，台北：东南书报社，1963年。

4 (明)李东阳等奉敕撰：《大明会典》，礼部，卷之五一，视学，第906～907页，台北：东南书报社，1963年。

5 彭华为首辅彭时之族弟，文渊阁大学士，成化二十二年升礼部尚书。周经之父周璋侍英宗北狩，土木堡之变同被俘，英宗天顺年间擢为南京刑部尚书。周经为天顺庚辰进士，侍皇太子讲《文华大训》，弘治二年擢礼部右侍郎。

6 (明)尹直撰：《睿斋琐录》七，收入(明)邓士龙编《国朝典故》卷五九，第13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图二三 明万历 余士等绘，经筵进讲，徐显卿宦迹图册（部分）
绢本，设色，纵62厘米，横58.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四 明万历 余士等绘，日直讲读，徐显卿宦迹图册（部分）
绢本，设色，纵62厘米，横58.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伺候。……各官行礼毕，裕王殿下就于本书堂里间就座，景王殿下入南书堂里间就座……内侍官捧书展于案上就案左立，讲读官以次进立于案前授书各十遍¹。

裕王、景王是坐着听讲的，坐的还是椅子，位阶还是比阁臣能坐的杌子或凳子要高，而讲读官与一旁协助展卷的太监都是站立的，讲读官与太监的位阶俨然相同。“徐显卿宦迹图”中有一段叙述万历十二年（1584）徐显卿充当展书官进行“经筵进讲”，其墨书文字如下：

自上登极初开经筵，余充展书官，至是十余年所矣。展书在御案之上，密迩天颜，又跪而开展，及起打躬，不敢背上行，必面伺天颜退行数武而后入班，欲从容周折中礼，难甚。讲案去御案丈余稍远，发明书义，专于启发宸聪……²

画中可见讲官、展书官等所有陪侍官员们都恭立两旁，只有年青的万历皇帝在书案后坐着听讲，此正是嘉靖四十年礼部奉敕所订的规制。另外一段徐显卿四十九岁时充任“日讲官”的“日直讲读”³，描写在文华殿后川堂的日讲，因为“御座不甚高，书案亦不甚大”⁴，画中可见讲官徐显卿正躬身指点著书案上展开的书，万历端坐书案前听讲〔图二三、图二四〕。可知不管是文武百官参与的“经筵进讲”，或阁臣、侍读学士的“日直讲读”，所有阁员、侍讲学士等官员，与屏风后的诸太监一样，全都恭立于万历之前或左右两侧，连个小杌凳都没得坐。

1 （明）俞汝楫等编撰：《礼部志稿》，卷六七，二王讲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第598～142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2 明万历余士等绘，“经筵进讲”段墨书，徐显卿宦迹图册（部分），收入杨新主编《明清肖像画》，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第41页，2008年。

3 明万历余士等绘，“经筵进讲”段墨书，徐显卿宦迹图册（部分），收入杨新主编《明清肖像画》，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第44页，2008年。

4 明万历余士等绘，“经筵进讲”段墨书，徐显卿宦迹图册（部分），收入杨新主编《明清肖像画》，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第44页，2008年。



图二五 明万历 黄地三彩双龙纹鼓凳
高 34.1 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图二六 宋 孝经图卷
绢本，设色，纵 18.6 厘米，横 529 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二七 宋 孝经图卷
绢本，设色，纵 18.6 厘米，横 529 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

（三）赐坐或侍坐，坐的是什么？

《明史》崔亮传中记道：“自郊庙祭祀外，朝贺山呼、百司笏奏、上下冠服、殿上坐墩诸仪及大射军礼，皆亮所酌定。”¹崔亮在元代是浙江行省的“掾”，即浙江行省长官的辅佐，于洪武元年（1368）冬入为礼部尚书，与李善长、宋濂、刘基等人共议礼制，同修礼书，几乎有关朝廷礼仪都参与议定或由他拟制，人臣受宠遇时“赐坐”的坐具等级也是崔亮在洪武三年奏定：

皇太子以下及群臣赐坐殿上的坐墩之制，参酌宋典，各为差等。其制，皇太子以青为质，绣蟠螭云花为饰，亲王亦如之。宰相及一品以赤为质，止云花。二品以下蒲墩，无饰。凡大朝会锡宴，文官三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皆赐坐墩。其朝退、燕闲及行幸之处，则中书省、大都督府官二品以上、台官三品以上，及其勋旧之臣、文学之官赐坐者，仍加绒罽绣褥，命其如式制之²。

坐墩是“造型近似木腔鼓的坐具”³，上下两头小，中腰大，状如鼓，传统上又称“绣墩”，也叫“鼓墩”〔图二五〕。所参酌的宋典，以宋人的“孝经图”为例，其《事君章第十七》：“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画中身着红袍的人倚着榻沿的靠背，靠背搭脑出头饰昂首龙头，表示其身份为“君”；其阶下左侧亭内一官员正襟危坐，似作“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状，所坐是一只青绿鼓腔坐墩，君臣两人坐具尊卑立见〔图二六、图二七〕。

崔亮“参酌宋典”定皇太子、宰相及一品以上官员赐坐用坐墩，但纹饰有别。大朝会锡宴时，坐墩的使用扩及文官三品、武官四品以上。按宋制，宰相、使相等文臣，节度使等武职，以及宗室等皆可坐于殿上，

1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三六，列传二四，第3930～3931页，中华书局，1995年。

2 《明太祖实录》，卷五四，洪武三年秋七月戊子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1059～1060页，1966年。

3 王世襄编著：《明式家具研究》，文字卷，第192页，台北：南天书局，1989年。

仅坐具有别，官秩一品的宰相与使相等坐绣墩，其余坐蒲墩¹。但宋代另有规定，宰相、使相于皇帝曲宴、行幸时可用“杌子”。相较之下，明代坐墩一体适用，仅以颜色与绣饰来区隔皇太子、亲王与宰相等一品大员，以及锡宴时扩及文官三品、武职四品以上，看似“化繁为简”并且“恩渥广被”，但宰相及一品以上官员未有位阶较高的“杌子”可坐，是变相贬低阁臣的地位，比宋制更为严苛，从而拉大君臣间尊卑之距离。

晚明文震亨的《长物志》说：“宫中有绣墩，形如小鼓，四角流垂苏者，亦精雅可用。”²明中期画家仇英的作品中有不少宫廷活动的描绘，一幅“宫中图”卷中，亭内的“皇帝”在持扇妃嫔的环侍下坐在设有靠背的交椅上，亭外阶下一官员正踏步阶上回首作引导状，另一官员正举步向前，欲俯身拜谒，“皇帝”的左右咫尺处各有一坐墩，仿佛准备赐坐所用。观其所覆织物如团云绣饰，以宫内赐坐之制仅恩及皇太子、亲王、宰相等一品以上，知此官员身份至少是一品。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代瓷制万历款“青花云龙纹鼓式绣墩”，行走的“云龙”为四爪，按明制，一品至六品用龙皆四爪³，故此坐墩应为一品以下官员所用〔图二八、图二九〕。

至于蒲墩，有资格上殿赐坐的官员无分品秩皆可用，唯未加装饰。退朝后或燕闲在家，以及随驾出外时，可在蒲墩上加毛料编织成的绒罽绣褥。不过，根据定制，并非“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的自行随意打造，即使燕闲在家所用之蒲墩也要“如式制之”。崔亮所定之式不详。晚名文人文震亨在《长物志》说：“用蒲草为之……四面编束细密坚实，内用木车坐板，以柱托顶，外用锦饰。”⁴也许可做宫廷蒲墩之参考。元人的“传经图”上，描写伏生授经鼈错的故事，其坐具可能即为蒲草编织的蒲墩〔图三〇〕。明代中晚期的版画《环翠堂乐府》中，一冠带官员坐在覆着椅帔的交椅上，



图二八 明 仇英 宫中图卷
日本，永青文库藏



图二九 明 青花云龙纹鼓式绣墩
面径 21.5 厘米，底径 21 厘米，高 34 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〇 元人 传经图
轴，绢本，设色，纵 130 厘米，横 56.2 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 按宋制，宰相、使相、枢密使、参知政事、仆射、三师、三公、学士等文臣，节度使、观察、上将军、统军等武职及宗室等，坐于殿上，但坐具有别，宰相与使相等坐绣墩，其余坐蒲墩，加罽毯。宋制，在外节度使若兼中书令、侍中或中书门下平章事者称“使相”，与宰相有互相牵制之用。详见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一三，志六六，礼一六，第 2683～2684 页，中华书局，1995 年。

2 (明)文震亨撰：《长物志及其他二种》，卷七，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 56 页，商务印书馆，1936 年。

3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七，志四三，第 1637 页，中华书局，1995 年。

4 (明)文震亨撰：《长物志及其他二种》，卷七，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 56 页，商务印书馆，1936 年。



图三一 明 汪廷讷撰，三祝记，万历间汪氏《环翠堂乐府》版
日本京都大学藏。周芜编著，《金陵古版画》，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页226～227



图三二 马机，明宫廷画家绘，明人出警入蹕图卷（入蹕图局部）
绢本，设色，纵92[1].1厘米，横3003.6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面前的二名官员正身对其弯身揖拜，身后各有同式蒲墩，俨然上级对下属的“赐坐”，蒲墩蜂巢式编织〔图三一〕，上覆碎花绣物，或可作为形制参考。

如此看来，明代宫廷君臣的坐具天悬地殊，人臣的坐具不但单一，且低矮卑微。君臣间唯一勉强交集的坐具是杌子——是“明人出警入蹕图”中供皇帝上马踩踏所用的马机〔图三二〕，也是皇帝赐坐人臣的坐具。若进一步检视宋室南渡后馆阁之设却有意外的发现。同为汉人立国的宋代，其临安朝廷除文殿及殿后秘阁各设御座、御案、脚踏等为皇帝御用外，其他各处轩堂，不是“金漆椅十二”、“黑光穿藤道椅一十四副”，就是“金漆椅、棹、脚踏各十四”等陈设，如此动辄十数张的坐具，又各配有长桌、脚踏，当非皇帝一人所用，应为多人办公之所。不但如此，连“拜阁待班之所”（就是等着上朝之处），都“内设金漆椅棹四”¹，而且还“金光闪闪”。相较之下，一百余年后自诩典章制度力追宋制的明代，其宫廷人臣所用是相形见绌的瞠乎其后者了。

五 内府太监受赐的“欃机”是什么？

大明宫廷之内，外廷人臣的坐具如此，在内府行走听候差遣的太监所坐为何？晚明太监刘若愚记道：

司礼监 赏印太监一人……最有宠者一，秉笔掌东厂，掌印秩尊，视元辅，掌东厂权重，视总宪兼次辅，其次秉笔、随堂，如众辅焉，皆穿贴里，先斗牛，次升坐蟒；先内府骑马，次升欃机。每升一级，则岁加禄米十二石²。

宫内的司礼监有如外廷的内阁，掌印太监有如内阁首辅，负责东厂的太监权重如次辅，以次的秉笔、随堂等品秩等同内阁其他辅臣，这个随侍皇帝的内廷成员，最终都有机会“升坐蟒、先内府骑马、次升欃机”。

1 （宋）陈騏撰：《南宋馆阁录》，卷二，收入《丛书集成续编》，第53册，第590～594页，社会科学类，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9年。

2 （明）刘若愚撰：《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第93页，古籍出版社，2001年。

据晚明文人的笔记，“蟒衣为象龙之服，与至尊所御袍相肖，但减一爪”。¹ 受赐四爪行蟒只是富贵临身而已，“升坐蟒”才是飞黄腾达的开始，因为“贵而用事者，赐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单蟒面皆斜向，坐蟒则面向正，尤贵”。² 而坐蟒之后的最高荣宠即是“升橈机”。正德四年（1509）即入内府的太监滕祥，在六十年后的隆庆即位之初调为司礼监掌监事太监，以年老受赐“坐凳”³，嘉靖时“随朝捧剑”的太监张宏，于万历朝冯保谪往南京后代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也受赏“内府得坐橈机”⁴。天启初年趋附魏忠贤的太监李永贞，刘若愚说他“为人有口，矜肆骄谲”，也曾“赐坐蟒、橈机”⁵，而熹宗（1621～1627年在位）即位初才入宫的太监徐文辅，因曾在宫外教导过熹宗乳母客氏的独子侯国兴，不到四年就“晋秩秉笔，赐坐蟒、橈机”⁶，不仅如此，魏忠贤得势之时，“逆贤名下，凡掌印、提督者，皆滥穿坐蟒……”⁷ 反观外廷阁臣的赐蟒，万历前期的首辅张居正，在奉迎其母入京时，万历及两宫太后“赐赉加等，慰谕居正母子，几用家人礼”，如此的显赫一时，也才先后受太后及皇帝赐“坐蟒”。⁸ 相较之下，太监要获此殊荣不但轻易，也似乎便捷许多。

至于内府“升橈机”中的“橈机”，可不是寻常外廷阁臣所坐一块板下四只腿柱的“橈机”。刘若愚的解释是：“其制如靠背椅，而加两杆于旁，用皮攀如轿，前后各用一横杠。然抬者不在轅内，只在杆外斜插杠抬，而正行之。所以曰机者，禁地不敢乘轿之意也。”⁹ 原来此“橈机”非彼“橈机”，太监坐的“橈机”其实是“轿”，只因“禁地不敢乘轿”的礼制而冠以外廷阁臣坐具之名，此无异为皇帝与太监间蒙混祖制的“掩耳盗铃”，睁眼说瞎话之文字游戏，“轿”与“橈机”若有知，俱当啼笑皆非。

得宠太监的“橈机”，表面上还是借用家具之名的钦赐之物，内廷太监另有一种称作“板”的坐具，据刘若愚所述：

其制如床面，高五寸许，于偏后些安一椅圈，前后以粗绒绳栓，用杠二条斜插台走，离地尺许。凡司礼监掌印、秉笔年老者，方私置坐之，不系钦赏，亦不系正经品级，自乾清门外，至西华门，东华门里止，自逆贤擅政，乃径自由门抬出，了无畏惧。¹⁰

名称乍看不如皇帝所赐之“机凳”，但作为人舁的乘具，功能一点不差，重点是连皇帝钦赐都免了，可以私置。所述乾清门外，东华门至西华门之间，几乎就是整个前朝外廷众臣行走执事之处，想象年老的太监们坐在私制的“板”上，穿梭于同样年老但只能坐机凳的阁臣间，有如对大明宫廷严谨礼制的“公然叫板”。而坐着“板”的魏忠贤，有时还会从玄武门入宫，谄附的太监如王体乾等，或在河边居住的众太监，“皆望尘

1（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第830页，中华书局，1997年。

2（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七，志四三，第1647页，中华书局，1995年。

3（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一一七，司礼监掌监事太监滕公祥墓表，《续修四库全书》，第599～6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4（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一一七，司礼监掌监事太监张公宏墓表，《续修四库全书》，第601～6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5（明）刘若愚撰：《酌中志》，卷一五，逆贤羽翼纪略，第79～80页，古籍出版社，2001年。

6（明）刘若愚撰：《酌中志》，卷一五，逆贤羽翼纪略，第84～85页，古籍出版社，2001年。

7（明）刘若愚撰：《酌中志》，卷一九，内臣服佩纪略，第166页，古籍出版社，2001年。

8（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一三，列传一百一，第5643～5653页，中华书局，1995年。

9（明）刘若愚撰：《酌中志》，卷一九，内臣服佩纪略，第169页，古籍出版社，2001年。

10（明）刘若愚撰：《酌中志》，卷一九，内臣服佩纪略，第169页，古籍出版社，2001年。

跪伏道旁，俟贤过方起，其市上买卖人观看，亦有叩头匍匐，俟过方起者”。¹这种宛如百姓伏道恭送的场景，明目张胆地与皇帝的出行互别苗头，堪称晚明宫苑内外的奇景。

内府得宠太监的“机凳”与“板”，都是人舁乘具，“升机凳”等同钦准乘轿。根据《明史》所载，外廷人臣的乘轿，大约只有黄淮在明宣宗时陪游西苑，“尝乘肩舆入禁中”，以及嘉靖间的内阁首辅严嵩（1480～1567），因年近八十，奉诏苑直也“出入得乘肩舆”，²蒙此“破格殊典”的官员终究少数，而且已是人臣的最高荣宠了。

明人的《立斋闲录》说：“国家阉宦实与公孤之权相盛衰。天子刚明，则天下之权在公孤，一或蒙蔽，则天下之权在阉宦。”³从“微不足道”的机凳小坐具，似亦可看出大明宫廷内的阁臣与阉宦的盛衰。同书也记景泰年间：

相传云，是时，每讲毕，命中官布金钱于地，令讲官拾之以为恩典。时高谷年六十余，不便俯仰，无所得，有一讲官尝拾以遗。今按：宣德中，李时勉为侍读学士，景陵怀金钱至史馆，撒之于地，令诸臣拾取。时勉独正立。乃呼至前，赐以袖中余钱⁴。

景泰皇帝要太监将钱布于地，令讲官俯仰以取的“恩典”，宣宗时已存在，宣宗还将站立的李时勉叫到前面来，给了袖中余钱。虽云传言，但空穴不来风，无风不起浪。可知明代阁臣与阉宦间不仅有盛衰之分，两者间隐然亦有施与受的高下之别。

太监传谕皇帝旨意，气焰有时还直逼皇上。成化十三年（1477）五月，受宪宗宠幸的汪直，提督西厂，声势如日中天，当时的太子太保、进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的王越与其交善。吏部尚书尹旻（天顺元年进士）和其他同僚想见汪直，请王越引介，尹旻私下先问王越要不要对汪直下跪，王越说：“焉有六卿跪人者耳？”说的是以六部尚书之尊岂要跪人。结果会见之际，王越先进去，“旻私伺之，越跪白乞，叩头出”。口上说得正义凛然的王越，在尹旻的偷窥下，不但跪着跟汪直讲话，讲完起身前还叩头。于是尹旻入见时，立马就跪，诸同僚也跟着跪，让汪直“大悦”⁵。明人的笔记述说此事时，直是痛心疾首：“我朝宦官气焰至此极矣，一时士风澜倒，至此极矣……盖所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骄人于白日……呜呼！……呜呼！……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百世之羞，不可复赎……呜呼！”⁶如此一迭声的“呜呼”，他们还不知道，此外廷大臣给内廷太监下跪的“百世之羞”，日后还是继续不停地上演，如武宗朝的刘瑾，熹宗朝的魏忠贤之辈等。

1 （明）刘若愚撰：《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第102页，古籍出版社，2001年。

2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五，志四一，舆服一，第1612页，中华书局，1995年。

3 （明）宋端仪撰：《立斋闲录》收入（明）邓士龙编《国朝典故》，卷六二，第10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4 （明）宋端仪撰：《立斋闲录》收入（明）邓士龙编《国朝典故》卷六二，第10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5 尹直撰，《睿斋琐缀录》七，收入（明）邓士龙编《国朝典故》，卷五九，第13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6 尹直撰，《睿斋琐缀录》七，收入（明）邓士龙编《国朝典故》，卷五九，第13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小 结

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监察御史李绛（764～830）向宪宗进言时说，“夫人臣进言于上岂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因为君尊如天，为人臣子上陈谏言是不太容易的¹。宋徽宗时的监察御史黄葆光（生卒年不详），同样以“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对徽宗欲将投奔来归的辽人擢为馆阁秘书丞而上谏力阻²。不过，即便如此，有唐一代的朝仪，君臣相见时，宰相不但有座位，还赐茶，即所谓的“三公坐而论道”。到了宋代，变成宰相上朝站着不坐，是因为开国的宋太祖赵匡胤本为后周世宗（951～961）殿前督检点，一夕之间黄袍加身，宰相为了表示忠诚拥戴，过自谦抑而逊让不坐。在五代时期皇帝经常“换人做做看”的纷乱之世，借此拨乱返治，提高朝廷的威信与皇帝的尊严，原是无可厚非，但相形之下，宰相之位却也开始显得卑微，相权逐渐低落使得君权相对提升³。明代开国的典章制度力追宋制之余，人臣之坐具却更为严苛窘迫，比之唐代君臣的关系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明末清初的史学家黄宗羲（1610～1695）说，明代人物不逊于汉唐，“其不及汉唐三代之英者，君亢臣卑，动以法制束之……”⁴明代君臣间的坐具不但“君亢臣卑”，君臣之间的距离看似咫尺，却又非常遥远，其间还有太监横肆其间“狐假虎威”的恣意妄为。近代治史学者主张“明代是中国君权发展的最高阶段”之说⁵，在明代宫廷君臣的起坐之间或可看出端倪，也使得唐宋时期监察御史笔下的“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具象化的跃于纸上。

[作者单位：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美术学系]

（责任编辑：陶晓姗 赵中男）

1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一五二，列传七七，李绛，第1837页，台北：艺文印书馆，1982年。

2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四八，列传一百七，第11028页，中华书局，1995年。

3 钱穆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73～75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

4 （明）黄宗羲著；（清）徐开任辑，《明名臣言行录》，序，《续修四库全书》第520册，第394～3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5 余英时著：《历史与思想》，第70～71页，台北：联经出版社，1983年。